

生命是个奇迹，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甚至在我们必须跟它
做斗争的时候，它仍需要得到我们的尊重……

Silent Spring

改变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振聋发聩之作

寂静的春天

【美】蕾切尔·卡森◎著 江 月◎译

50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之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改变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振聋发聩之作

寂静春天

【美】蕾切尔·卡森◎著 江月◎译

50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之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静的春天 / (美) 卡森著 ; 江月译.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04-5169-0

I. ①寂… II. ①卡… ②江… III. ①环境保护—普及读物 IV. ①X-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7125号

寂静的春天

作 者: (美) 卡森

责任编辑: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om.cn>

<http://www.nwp.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9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169-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 言

作为一个民选官员，此刻为《寂静的春天》作序，我必须怀着一颗谦敬的心，因为作者蕾切尔·卡森已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有力地证实，一种思想的力量远远强于政治家的力量。

当《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首次出版的时候，（美国的）公众政策中还不存在“环境”这一条款。在部分城市，特别是洛杉矶，烟雾已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它太显眼，而并非真正认识到它对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

资源保护，即环境保护主义的前身，曾经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代表大会上提到过，然而，也只是在讨论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问题的时候顺便稍带一提。除了在普通人们难以见到的科技刊物中有那么几个零散的词条之外，其实并没有公众在讨论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等化学药品正日益增长的潜在危害。

《寂静的春天》好似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它用无比深切的感受，全面深刻的研究与雄辩有力的论点彻底改变了环境历史的进程。假如这本书没有问世，那么，环保运动可能会被延误很久，也许，现在根本还未开始。

作为海洋生物学家的卡森，有一段时间曾经在联邦鱼类和

野生生物局工作，然而，她本人以及她的书仍旧遭到了来自污染获利者的强烈抵制，好几家大型化工公司都试图禁止《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出版，彼时，人们大概不会对其遭抵制的原因感到奇怪。

当该书以《纽约客》杂志为载体发表时，立刻出现了一大片反卡森的论调，指责她是歇斯底里的极端主义者。直到今天，只要有人对那些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获取利益者提出质疑，此类指责随时会再次涌现（1992年，我在竞选总统时被生生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我说这话的目的并非为了夸赞自己。然而，我一直将它视为光荣的标记，我知道一旦有言论涉及这些环境问题，便会激起凶猛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反对）。《寂静的春天》出版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传播它，但此时，反对该书作者的势力却是非常可怕的。

蕾切尔·卡森遭遇到的攻击，可与当年出版《物种起源》的达尔文遭受到的恶毒诽谤相比。不仅如此，因为卡森是一位女性，很多冷嘲热讽甚至直接与她的性别挂钩，说她是“歇斯底里”的典型例子。此外，《时代》周刊还给她多加了一条指责，称其使用了“煽情的语言”。甚至还有人轻蔑地称她是“自然的女祭司”。

与此同时，她的科学家声誉也遭到攻击，她的对手不惜出资大搞宣传以达到否定她研究工作的目的。那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并得到大力资助的反面宣传运动，只不过它反对的对象并非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过程中，卡森依靠的是谨慎地遵循真理和超凡的个人勇气这两种决定性力量。对于《寂静的春天》中的每

一个段落，她都做了反复的推敲，通过这些年来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她书中的种种警告都是正确的，事实甚至比她预言的还要严重得多。超凡的勇气和远见已使她所做的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初衷，即对那些强大的而又有着高额盈利的工业界的挑战。

在她写《寂静的春天》时，正忍受着乳房肿瘤切除的病痛，并且她还在接受放射性治疗。此书出版两年后，她因乳腺癌辞世。不得不令人深思的是，最新研究指出，这种疾病和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卡森在写这本书时，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创作。

她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观念——万物的中心和主宰是男人，科学史的主导基础也是男人——这几乎被视为一个终极绝对理念。当一位女性勇敢地站出来挑战这一传统时，严格维护这一传统的一位卫道者罗伯特·怀特·斯蒂文批判她说：“此争论赖以支撑的症结问题在于，卡森小姐坚持认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是自然平衡；然而当代科学家及化学家、生物学家坚信，大自然正被人类牢牢地控制着。”现在看来，这番话不仅傲慢，而且离奇得如同平面地球理论。

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世界观非常荒谬，但它恰恰对卡森当时的革命性行为做了一个很好的反衬。来自工业利益集团的攻击是在人们预料之内的，但是连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则是出人意料的。而且，滴滴涕杀虫剂的发现者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想要扼杀《寂静的春天》是不可能的。虽然书中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得到解决，但书本身深受公众的欢迎，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此前，卡森已凭借《海洋传》和《海之边缘》两本畅销书，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也博得了公众的赞誉。

《寂静的春天》一书，是在10年之前出版的，它的出版可谓跌宕起伏，其过程丝毫不“寂静”。比起当初刚听到或注意到这本书的时代，美国人在这10年中，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位睿智的女性是和这场运动同时出现的。

最终，政府和民众全部都卷入了这场运动——除了读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那些通过报纸或电视了解到这本书的人。在《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50万册之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意为它制作了一个时长1小时的节目，为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两大出资人甚至取消了对电视台的赞助，但该电视网并没有停止广播宣传。

肯尼迪总统专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这本书进行了讨论，并且派出了一个专门小组对书中的结论展开调查。当这个专门小组报告他们的调查结果时，这份报告书成了对企业和官僚熟视无睹的放任行为的起诉书，同时，这个报告证实了卡森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

之后不久，国会召开了多次听证会，第一批基层环境保护组织也相继成立了。

《寂静的春天》播下的这颗新行动主义的种子，现在已成长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力量之一。当蕾切尔·卡森于1964年春逝世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她的声音绝无可能被掩盖——她不仅唤醒了我们美国，而且唤醒了整个世界！

可以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是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

起点。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而言影响深远。母亲曾坚持要我们在家阅读书籍，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读完后还得围着饭桌讨论一番。我和姐姐都不喜欢在饭桌上提到哪一本书，然而谈到《寂静的春天》的话题时，却总是很开心，那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由此可以说，蕾切尔·卡森也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在她的感召下，我写了《平衡中的地球》一书，此书由休顿·麦夫林公司出版，这并不是巧合，在卡森的整个论战过程中，这家公司始终支持着她。此后，这家公司陆续出版了很多与我们世界面临的环境危险有关的好书，并因此享有盛誉。

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卡森的照片，它的位置在政治领袖、总统和总理们照片的中间。卡森的照片多年来一直挂在那里，我觉得它应该挂在那里。卡森对我的影响力显然大于那些人，也可能大于那些人的总和。

身为科学家兼理想主义者的卡森是孤独的，然而她却善于倾听民众的声音——这对一个名声显赫的人来说，通常是难以做到的。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构思，源于来自马萨诸塞州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的妇女寄给她的一封信，信里说，很多鸟类正死于滴滴涕中毒。如今，由于卡森的原因，滴滴涕已被禁用，她尤其关心的鹰和移居的猎鹰等一些物种，也已不再面临绝种的危险。或许人类本身，至少有不少人的生命由于她的著作将会获得救赎。

难怪人们将《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提并论。

美国社会的改变，正是由这两本奇书发轫的。当然，这两本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之处。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将一个早已占据人们头脑且引发公众争论的焦点问题戏剧化了；她也一个全国上下关心的焦点问题人性化了。她笔下的奴隶形象唤醒了民族的良知。在南北战争高潮时期，亚伯拉罕·林肯见到她时说：“引发这场战争的小妇人就是您。”

与之相比较，蕾切尔·卡森是在对一个当时人们难以意识到的危险发出警示，她的根本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而并非是提供证据以证明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成就显得更加难得、更加可贵。

1963年，她出席国会作证时，参议员亚伯拉罕·李比克夫所说的一句欢迎词恰恰再现了一个世纪之前林肯的话，他说：“卡森小姐，引发这一切的那位女士就是您。”这多么具有象征意味。

两本书还有一个重大区别，这个区别关系到《寂静的春天》的核心内容在时间上的延展性。

在短短的几年内，奴隶制确实终结了，虽然许多的后续事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者更多时间去处理。但是，假如说靠笔杆子的力量能够废除奴隶制的话，却不能使化学污染就此停止。

即使有卡森的有力论证，即使美国采取了禁止滴滴涕等行动，但是环境问题却日益恶化，丝毫不见好转。可能灾难来临的速度减慢了，然而这件事本身却不能令人安心。

自从《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仅是用在农场中的农药就已高速增长到每年11亿吨，且这些危险性极大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力也有了4倍的增长。在美国，我们是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是

我们并没有间断过其生产，之后向其他国家出口。

这牵涉到的问题不只是把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危害转嫁给别国获取利益，还反映出人们对“科学问题无国界”这一基本观念根本没有认识。要知道，不管哪一处食物链中毒，最终都将会蔓延到整个地球。

卡森曾在美国园林俱乐部做过演讲，她在最后的几次演讲中表示，在情况好转之前，现实会变得更糟。她说：“这众多问题都没有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她还甚至发出警告，我们将来要承担的风险会随着我们等待的时间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多。

“此时我们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整个人类都可能暴露在化学药品的侵害中，这些化学药品已由动物实验证明极具毒性，而且有不少例证表明毒效可以积累。人类的这种暴露开始于出生时甚至是出生前。我们如今的做法若是没有改正，那么这种暴露将会持续危害现代人的一生。由于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指导经验，所以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结果。”

在她讲这些话之后，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尝到了很多恶果，例如，可能跟农药有关的癌症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更令人苦恼的是，我们并不是没有付出行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但我们所做的只是九牛一毛。

1970年，环境保护署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蕾切尔·卡森所唤起的环保意识有关。农业部的农药管理法和食品安全调查局转移到了环保署，因为农业部并不在意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危害性，而只关心其好处。

从1962年开始，国会就三番五次地提出对杀虫剂的评估，并对杀虫剂注册和信息的标准问题做出了明文规定。然而，很多标

准却被无视、搁置甚至是破坏了。举例来说，虽然环保署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着手制定”保护农场工人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了，但是，当克林顿-戈尔政府主政时，这个标准仍然没有实施到位。像滴滴涕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禁用，窄谱杀虫剂取而代之，然而，后者的毒性更大并且尚未得到充分检测。

大部分农药制造工业的强硬派人士都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成功地推迟了。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对这类工业宠爱有加，这是更令人惊讶的。

管制食品和医药的法规的严谨度远远超过为管制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而设立的法规标准，这些法规不仅宽松，而且在国会的庇佑下难以实施。当政府制定一种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所考虑的除了它的毒性之外，还包括它的经济效益。这个如此不让人信服的立法程序势必会引起农业增产（不用农药也可以实现农业增产）和控制癌症以及神经疾病潜在增长之间的矛盾。

另外，要把一种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消除，这一过程通常需要的时间是5-10年。尽管新型杀虫剂的毒性很强或更强，但只要其效果略胜于当前的杀虫剂，就会被批准上市。

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常处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的麻木状态。如今的体制属于浮士德式的交易，即为了换取近期利益不惜以长远悲剧作为代价。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这种短期利益的确是非常短的。很多杀虫剂无法减少害虫的总数，或许刚开始的时候害虫有所减少，然而害虫通过基因突变最终会适应生存环境，导致杀虫剂的效果丧失。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侧重于研究杀虫剂对于成人的影响，事实上化学药品更容易侵害孩子。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对单个杀虫剂

进行孤立的研究，科学家们往往忽略了对多种杀虫剂的联合作用的研究，然而真正存在于田野、牧场和河流中的潜在危险恰恰却是这种联合作用。

从本质上讲，我们所继承的体制的特点是：法律与漏洞同在，执行与拖延并存，以虚华表面勉强掩饰整个失败政策。

蕾切尔·卡森警示我们，滥用杀虫剂违背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制造出了她预言的“死亡的河流”，这是最坏的情况；它们引起的危害较为缓和，但却几乎得不到什么长期效益，这便是最好的情况。

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的22年中，法律、法规和政策系统所引起的反应都是远远不够的。卡森不仅谙熟环境科学，对政界的非同一般之处也相当了解，对失败的原因也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在几乎无人谈及与特别利益相关的金钱和势力这一孪生污垢的当时，她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说道：“利益……都进了那些企图阻止修正法案的人的口袋。”

她甚至对政府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准备将其废除）的政策提出谴责，她说，此种减税“意味着，具体点来说，如今化工工业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代价跟未来的立法努力相抗衡……想要不受法律约束而自行其事的工业界当下其实已经自其争斗中获利良多”。简言之，她大胆设想的农药问题，会由于她明智预言的政治问题的存在而长期存在。因此，要想清理污染，需先清理政治。

一种多年持续失败的努力，正好解释了其他努力也都一再失败的原因。其结论虽然令人无法接受，但同样令人无法否认。

美国在1992年1年里，总共使用的杀虫剂高达22亿磅，男人、女人和儿童平均每人8磅。研究表明，现在使用的许多杀虫剂是高

度致癌的；其他能够毒害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的杀虫剂，或许也能毒害人类。正如她所说，“我们可以通过用一种蜡打磨地板来杀死爬过地板的虫子”，但今天杀虫剂的使用数量仍然多得惊人——90万个农场和6900万个家庭以上。

环保署在1988年的一份报告中说：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已经污染了32个州的地下水，其中就有除草剂阿特拉津，此化学药品名列潜在的人类致癌物质之中。每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田里会施用此药7000万磅，其中150万磅通过地下水流入2000万人的饮水之中。市政污水处理系统是无法将阿特拉津消除的。据统计，在春季，水中的阿特拉津含量很多时候会超过安全饮水法所规定的标准，特别是199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超标的地表水竟然达到了25%。

其实，在美国，滴滴涕和多氯联苯被禁另有原因，然而，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可模拟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的杀虫剂却又大量问世了，而且引发了新的严重问题。德国、苏格兰、密歇根州以及其他地方通过研究指出，这些杀虫剂能够导致人类生育力下降，增加睾丸癌和乳腺癌患病几率，还会导致生殖器官病变。

在美国，过去20年中，由于雌激素农药滥用，睾丸癌的发病率大约增长了50%。另外有证据指出，世界范围内，男性的精子数量降低了50%，其原因尚未了解。有相关文献记载，确凿可靠的证据证明：此类化学物质对野生生物的繁殖能力产生了干扰。

在审阅过《环境健康研究所期刊》提供的数据之后，三位研究者得出一致结论，“当下很多野生生物正面临着危险”。或许，众多的此类问题正是动物和人类生殖系统出现大量不可预测病变的先兆。然而，现行法规风险评估的范围内，并不包括这些杀虫剂的潜

在危害作用。一个新的行政提案郑重要求研究此问题。

自然，这些化学药品的辩护者们将会做出一系列传统的反应，诸如：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无法对化学物和疾病间的直接联系做出明确论断；巧合与因果关系（尽管一些巧合要求推导出谨慎而非仓促的结论）并不相等；或老调重弹，认为动物实验无法对人体情况进行绝对明确的说明。

这一切论调都不禁使人想起当年因蕾切尔·卡森著作而引起的、来自化学工业和受其资助的大学校园里的科学家们的攻击。这些攻击在她的预料之内，为此她在《寂静的春天》里指出：

“当公众……发出抗议之声时，只提供几句半真半假的言语作为镇定剂。我们急需揭穿那些伪善的保证，剥掉那包裹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的糖衣。”

八十年代时，特别是在詹姆斯·瓦特掌控内务部和安·高萨奇主管环保署的这个时期，是对环境的无知的顶峰时期。毒化环境几乎被美化成强硬经济实用主义的标记。

举个例子，在高萨奇主管的环保署里，取代化学杀虫剂的综合害虫治理计划（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其实已被完全废除。与该计划有关的出版物，环保署都予以禁止，并且使该计划的实施丧失了法律效力。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上台就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并决心去扭转杀虫剂污染成风的严峻局势。这个政策包括三项原则：标准更加严格，使用量减少，研究并广泛推行可替代性生物制剂。

显然，在考虑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的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因素，这是使用杀虫剂的明智方法。不过，我们也必须对这个范围及这个公式之外的特殊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标准务必要清

楚、严格，测试务必要彻底、诚实。

从开始到现在，儿童体内杀虫剂残毒允许值一直被我们设得比准确值高几百倍。有一种经济收益计算能够证明它的合理性吗？我们不仅要测定这些化学品对成人的影响，还要测定其对儿童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对一定范围内化学品的各种组合进行检测。我们进行检测除了旨在减少我们的担心之外，更是旨在减少那些使我们无法放心的物质。

假如一种杀虫剂已不再需要或者在一定情况下已经失去效力，那就干脆不要用它，更不要维持它。因为效益不应是可能的、短暂的或是推测的，而是实在的。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对生物制剂更加重视起来，尽管工业部门及其政治辩护者们对此充满仇视。在《寂静的春天》里提到了“一系列真正优秀的替代物可以取代化学对昆虫的控制”。这种替代品如今不断增多，然而众多官员却毫不关心，同时生产商也在极力抵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无毒的代用品进行大力推广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一端是农药生产商及农业社团、另一端是公众健康社团的文化沟壑上架起一座桥梁。两端是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观点更加不同的人们。只要他们心里的那个猜疑和忌恨的鸿沟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峙，那么，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生产和利润都与污染紧密相连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有一条路有望结束这种体系，并开始促使我们缩小这种文化差异，这条路就是将推行化学药物的替代品的任务交给基层的农业推广站。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食物生产和健康保护的两类机构彼此之间进行正式且持续的沟通。

参与缔造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新政策的人有很多，

或许其中最至关重要的是一位女性，1952年是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最后一年，她辞职时担任着一个中级职务，辞职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全身心的写作，不再仅靠周末和晚上那点时间。从精神上讲，本届政府所有重要的环境会议，蕾切尔·卡森都出席了。我们可能还未能一下子做到与她所期待的一致，但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正是她所指明的方向。

《寂静的春天》于1992年被一个由杰出美国人组成的小组推选为近50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书。这些年来，这本书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论争的洗礼，但它仍然是一个不断打破自满情绪的充满理性和理智的声音。

这本书不仅在工业界和政府中掀起了环境风暴，唤起了民众的瞩目，同时它还将拯救地球的责任赋予给了我们的体制本身。尽管对此政府漠不关心，但消费者们反对农药污染的呼声会越来越强烈。如今，降低食品中的农药含量正演变成成为一种食品促销手段，同时也正转变为一种道德规范。

政府必须要有所行动，而民众也必须当机立断。

我相信，民众不会再容忍一个无所作为或做错事的政府。

蕾切尔·卡森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涉及问题的范围。她带领我们回到在现代文明中已丧失到令人震惊的地步的一个基本观念——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

《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就像一道闪电，首次告诉人们：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中，为了描述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富于创意和深意地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有关“人迹罕至”的道路的著名诗句。现在，尝试走上这条路的人已经有一

些了，然而，能够像卡森那样将整个世界领上这条道路的却几乎没有。

她的作为和她所揭示的真理，以及她激发起的科学研究，不仅有力地论证了限制使用杀虫剂的必要性，还有力地证明了，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有能力为世界带来重大变化！

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